

1919'

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

重返五四现场

典藏版

叶曙明

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1919，

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

重返五四现场

叶曙明

——
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叶曙明

重返五四现场

1919，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

重读五四

——再版前言

叶曙明

距离这本书的初版，转眼已经过去六年了。六年前这本书刚出版时，有记者朋友问我：你为什么把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向前推进至1895年的公车上书，把这一段历史称为“五四时代”？为什么将公车上书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？

当时我说：因为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现代版的春秋时代，在此之前，无论是洋务运动、同治中兴，还是“经世派”（包括龚自珍、魏源、林则徐、郭嵩焘、徐继畲、梁廷枏等人），他们基本上是在“用”的范畴内打转，没有涉及到“体”的问题，也没有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。而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则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，引向了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来，这是划时代的。刚好它也发生在4、5月间，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场流产的五四运动。

今天，当这本书重版时，这个问题自然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了。但我关心的不是五四运动的起点在哪里，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五四时代。当清代末年，西潮东来之际，张之洞提出“中体西用”的这个口号，是不得已的无奈之选，因为当时西潮之盛，汹涌澎湃，浩浩

荡荡，想关门闭户是不可能了，守旧者希望以这个口号抵挡一阵子，至少不要让祖宗创下的“体”败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上，拖得一天算一天，等熬到自己身后，管它洪水滔天；而革新者则希望以“用”为突破口，最终会走到“体”的改变。

因此，可以说无论守旧者还是革新者，内心深处其实都已明白，“体”最终是要变的。但历史发展的现实，却让革新者大跌眼镜，“西用”的引进，不仅未能成为改革“中体”的突破口和推动力，相反，“西用”引进得愈多，改革“中体”的阻力愈大。等到中用与西用经过几代人的混血杂交，已经难分彼此时，人们反而觉得，不要西体，中国也一样可以富足强盛，也一样可以雄视天下，万国来朝。于是，重振儒教，光复旧物的呼声，愈来愈高，甚至连废除公历、恢复夏历，以黄帝纪元这一类在五四时代已遭共弃的主张，也竟在 21 世纪再次冒出，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。

戊戌变法造就了梁启超，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。梁启超、宋教仁与陈炯明这三个人，我认为是北洋政府时代最具现代政治意识、最杰出的人物，如果中国也有“五月花号”，那这三个人一定是《五月花号公约》的起草人了。民国成立之初，如果由他们三个人来做，也一定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新局面。可惜，梁启超开了一个头，宋教仁想接上去做，结果被暗杀了；陈炯明想接上去做，结果成革命的“叛徒”了，梁启超自己也是惨淡收场。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新大陆，而是一个整天把“三代之治”挂在嘴边的国家，是一个连公历都时时有人想废除的国家。

当然，我们谈春秋战国的思想史，不可能只谈孔、孟，而不谈老、庄、墨等诸子百家，也不能把某一家视为进步，其他皆为反动。谈新文化运动也一样，这个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文化人物，必须把梁启超、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钱玄同、章太炎、林纾、刘

师培、黄侃、辜鸿铭等人都包括在内，才足以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轮廓。把他们的文化背景、思想脉络都摸清楚了，才会大概明白，为什么我们总也走不出五四时代。

五四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之一，就是百家争鸣。国家的进步有赖于思想的进步，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百家争鸣。在五四的思想与文化界，并不存在谁是正面人物，谁是反面人物的问题，更不能简单地以“进步”与“反动”的二分法来归类，不能说陈独秀一派是正面，林纾、辜鸿铭一派是反面的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，最大的毛病就是以独尊来反对独尊，以思想专制来反对专制思想，公开提出“不容匡正”的主张。这难免陷入了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悖论之中。

在当时，他们的这种主张，如果仅仅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，倒也无妨，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，仍然独尊一家，而贬抑其他诸子百家的话，那就等于否定了“启蒙”的基本意义，又回到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 × 术”的老路上去了。

有人说，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，也有说，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腰斩。这要看“新文化运动”怎么定义了，如果定义为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，那五四运动确实令这个时代灯暗转场，转向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代；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“文学革命”运动，那五四运动不仅不是一种“干扰”，而且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首先，我们不妨仔细探讨一下，陈独秀所主张的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这二者是承载着新文化运动的两只轮子，不能不弄个透彻明白。新青年们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。陈独秀的科学，早期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科学的；到后期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

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正的科学。而胡适对科学的理解是：尊重事实，寻找证据，证据走到哪儿去，我们就跟到那儿去，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

新青年们对民主也有不同的理解。陈独秀与李大钊主张的民主，接近于卢梭的“人民主权论”，它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，而是通过“公意”，或称“普遍意志”，简单地用现代语言说，就是“群众运动”来体现的。对此，李大钊在《强力与自由政治》一文中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而胡适则认为，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其核心价值是：承认人人各有价值，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。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，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，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，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。少数服从多数，但多数不能抹杀少数，不能不尊重少数，更不能压迫少数，毁灭少数。

新青年在把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高高举起时，没有同时把自由与法治的旗帜高高举起，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严重的缺失，导致后来“群众运动绝对主权”、“群众运动难免过火”、“矫枉必须过正”一类观念，大行其道，影响了中国几十年。

什么是民主、自由？做一个蹩脚的归纳：民主就是说“是”的权利，自由就是说“不”的权利。说“是”，意味着我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入场券，可以通过多数决定原则投出我神圣的一票。说“不”，意味着我在公共权力面前，有保持个人意志的权利，不会因为对公共权力说“不”，而受到歧视、压迫，有免于恐惧的权利。这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，应该得到宪法、法律的保障。

当五四运动发生火烧赵家楼和殴打官员的事情后，《每周评论》上有一篇文章说：“无论什么人，有他的自由，不许他人侵犯，这话本来极是。可是侵犯人的，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，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。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，因为主张平和，给

群众打死，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。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。”也就是说，只要是出于群众运动，即使杀人，亦属无罪。这是一个步入歧途的危险信号。后来，在国民革命时代流行的口号叫作“不为同志，即为叛逆”，便是走到了极端去的新青年主张。

六年前，当这本书刚出版时，许多读者对我把陈炯明评价为与梁启超、陈独秀并立的新文化运动三个代表性旗手之一，感到不解。六年之后的今天，理解并接受这一看法的人，已愈来愈多了。

我为什么推崇陈炯明呢？因为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，他没有搞群众运动，没有演双簧戏，没有动不动就打倒这个、打倒那个，既没有主张全盘西化，也没有主张全盘摧毁传统文化，他只是在自己影响力可及的范围内，真正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，他用事实证明了，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，息息相关。对这个混浊的社会，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。

陈炯明在广东禁烟、禁赌、办大学、办平民教育、推行城市清洁卫生、制订省宪法、维护言论自由、推行自治运动等。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，人们也许永远以为，新文化运动，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墨官司。但历史是公平的，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，总会留下一扇窗子，哪怕是一条小缝隙，让后人可以看到，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。

因此，只要在我们的记忆之中，新文化运动依然是以“进步与反动”相争的革命形态呈现；只要在我们的叙述之中，五四运动依然是以“爱国与卖国”的民族主义主题，作为它唯一彰显的历史意义，那么，陈炯明存在的价值，便不会打折。

这本书的副题是“1919，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”，对于刚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中国来说，那确实是一段青春的记忆。纪念与反思五四有很

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，其实都是在五四运动时定下了基调，第一代的中国共产领袖，几乎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。今天我们所尝到的果，无论是甜是苦，我们走过的路，无论是直是弯，都是那时种下的因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五四时代的光芒，才总显得那么耀眼；五四的话题，才总是那么激动人心。

今天的中国，与六年前的中国相比，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，今天我们再次重读五四历史，也许会得到更多新的感悟。

2015 年 3 月于广州

我们的五四

——序叶曙明《重返五四现场》

余世存

五四运动似乎已经盖棺定论。这个由蔡陈胡鲁们引导、由傅罗段等人发动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，经由国共双方以及胡适、罗家伦、毛泽东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巨人们的评估，已经被定性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奠基者。即使反对五四运动的论断，也承认五四运动所起的重大作用：五四运动撕裂了文明或说我们民族的文化。

但五四运动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。它的当时究竟是什么状态，至今人言言殊。当时参与的各方是否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？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是否如同当下的网络中国，有着混乱的自由？当时人以及当下人是否都善用了这种自由？当时人和当下人是否有着足够的思想资源、道义支撑？不仅如此，关于五四运动的全部言说仍归属两大阵营：赞成，反对。即使“胡适，还是鲁迅？”这样的伪命题滋养当代知识界十年之久，赞成者仍难在复述旧言外有新说辞；而反对者或噁嘴其言或冷嘲热讽，甚至从“原因的原因的原因”中将百年中国的罪苦归结到五四运动。

近百年前的一场运动至今仍给我们情感的波动、认知的分野。这说明我们确实在心智、视野、群己权界、历史观念、先人尊崇等方面仍未走出五四运动的阴影；我们在革命、改良、文化、运动等方面仍未有历史的共识或伦理共识。据说西人生活中有二三十年以上者即为古物、即属历史，即可成为公共财产供全民保护、认知、怀古。我在大众游玩的地方，也确实见过墨索里尼的遗迹，独裁者当年演讲的阳台；我见过对垒牺牲的两军将士的墓园，那样分明又统一地成为今人的历史风景，一种意味深长的厚重之美。但我们的五四，无论赞美或反对者其实都尘封了它，其中的人物至今因阵营归属而未能展现其全部的真实，未能成为人民当下生活的真正背景。

二

康梁孙黄的革命，缺乏西人革命那之前可长达百年的启蒙、理论准备。顾、王、黄等人的担当，曹雪芹、龚自珍们的天才创作，仍只是挽歌而已。徐继畲、魏源等人的思考，也不足以给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。故曾左李摸着石头办洋务，康梁黑猫白猫地借孔改制变法，孙黄自备学说或建国大纲，政道合一，酿成“不彻底的”辛亥革命。

蔡陈胡鲁们的新文化运动，本是补辛亥革命的思想道义之缺失，在政统崩解重构之际，别立可审判、监督、分权的道统。但运动的领袖们虽然重估一切价值，虽然尊奉德赛二先生，他们并未能像启蒙运动中的西人那样获得人的自觉而沟通人心，也未能像百科全书派那样为华夏或人类的一切领域立言立法。

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对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圣贤有失公允。何况当时的中国确实内忧外患，亡国亡种之说夸张，但在文明的他者眼中，

中国实为木乃伊般的国度。以胡适之温和，到抗日战争，才说中国终于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演变成现代国家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同情地理解新文化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背书。它支持了政治革命、全民革命；但它还没有承认阶级革命、暴力革命。它失望于政统的混乱，但它未能夯实并强调道统，它未能如周作人说的努力经营“自己的园地”，反而介入并为政统的变革所裹挟。

如果没有了新文化运动，辛亥革命将如何演变？孙文学说肯定不是和谐社会理论，但他有建立道统的用心，袁世凯复辟也是敏感到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欲寻求道统的支撑，因此，南北军阀的割据和兼并不会比五代十国更糟，反而会在思想资源上争胜。显然，中国仍会在世界的带动下进入革命的世纪。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少有从道统的角度梳理革命，多将现成的革命介绍给政统以充任思想争胜的奴仆、苦力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罗家伦、张国焘、毛泽东们知行合一，成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先驱者，加快了这一革命进程。“不彻底的”辛亥革命被更彻底的革命抛开。革命发生了变异，阶级革命、暴力革命登场，到五四运动，拉开了中国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的序幕。

三

但五四运动并非一个组织严密、线索清楚的历史现象，相反，它是一个混乱的状态。

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想过百科全书般的立言立法，如陈独秀说，文化是包含着科学、宗教、道德、文学、美术、音乐等方面的运动；但新文化运动中，运动居多，创作居少；口号多，作品少；领袖多，群众少。缺乏作品和社会基础的运动只能是复调而众声喧哗的。因此，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只是明星式人物，运动难以深入，多只是各色人

等的秀场。表态，或者自说自话，自我表演。

如叶曙明先生观察到的，这个秀场如此热闹：“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鲁迅诸人，固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；然吴稚晖、张一麀、袁希涛、黎锦熙、马裕藻等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的人，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；提倡德先生、赛先生的，搞新村运动的，搞工读互助的，主张安那其主义的，主张社会主义的，主张实验主义的，主张马克思主义的，主张根本解决的，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，要打倒孔家店的，要整理国故的，还有《国民》、《国故》、《学衡》、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黄侃、林纾们，大大小小的‘选学妖孽，桐城谬种’们，所有南腔北调，精彩纷呈的声音，共同构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。”

这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，在参与者之间没能形成对话的规则、共识；更不用说，参与者们跟政界、商界形成可能的沟通。英国哲学家罗素当年曾说中国处于“混乱的自由”中，这种混乱的自由不过是历史老人的“一放就乱”，但新文化运动的各界人士却没有意识到这珍贵的历史机会，从而有所回馈历史和命运。他们多大出风头，他们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异口同声地哀叹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国将不国。他们中的少数天才直到后来才充任了思想资源的提供者，才“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”。他们中的少数领袖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伦理底线的重要，才感叹社会革命中有无“人味儿”的重要性。

因此，五四运动必然上场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变体或孝子，注定要以弑父的姿态收场。这个弑戮行为，不仅跟知识前辈分道扬镳，而且要跟政权摊牌。火烧赵家楼，“大规模的群众暴动骚乱事件”，不同于王朝时期的民乱，一个当时的记者在“五四”第二天写道：“吾人骤闻是种消息，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，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，又发见于吾华首都。”

四

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青年、学生。如果一个家庭的父权衰败，我们没有理由谴责孩子们的逆反、弑父、出走，我们可以痛心孩子们对父权的复制和可笑的摹仿。如果一个社会除主旋律外没有像样的精神食粮，父辈们没有多少责任感，更没有有效解决问题的制度机制，那么青年人就当然以青春的本能抗争。胡适说：“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，政府太卑鄙腐败了，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（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），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，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。”深知其中厉害的毛泽东甚至天然地站在学生一边，他的名言就是：“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”

而镇压，谬托历史知己者的镇压，不过是“一收就死”，将自己和中国置于一种奴隶奴才般的生存状态。中国革命，百年变乱不断，却难以在学生和政府之间、在官产学社会各界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。法兰西革命，历经百年，左右摇摆四五次，才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。中国革命，历经百年，左右劫乱不断，仍离现代遥远。

五四运动撕裂了老大中国的面纱。它提出的问题：中国的家庭之恶、中国的政治参与机制、中国的代际和社会沟通渠道，以及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等中国人的生活模式，等等，至今没有解决（毛泽东的革命方式，将婚丧嫁娶等等的简化革命化，至今已经雨打风吹去）。五四运动的撕裂、学生们的举动并没有错，换言之，青年学生不过是到“最后的关头”发出的声音。错的是当时事后的当政者、社会领袖们，如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、蔡元培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胡适、孙中山、陈炯明等人。中国只有走全民革命的道路，否则，“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”还会将人的生存数据化、指标化，将人的生活窒息；中

国只有走政治革命的道路，否则，再怎么好的“好地狱也将失去”。

亚洲第一共和的“国父”认识到了“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”，他称马克思为社会病理学家的认识也足够深刻，但他没有因此反思革命，反而仍停留在对自己学说的自负上，仍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使命或影响在于“五百条枪”的暴动上。如果孙文能够介入、参与新文化运动，或者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；如果他能够关注五四运动，或者这些社会道义资源、这些在野政治家和民间意见领袖们，能够接续当年他和黄兴、宋教仁的事业。中国的革命世纪也许会呈现出不同的格局。

五

杀君马者道旁儿。民亦劳止，汔可小休。蔡元培当年一句“我倦矣”已经不是校长心态、父辈心态，而是书生意气。

这样的教训在五四时期还可以举出很多。胡适也好、梁启超也好，都有过这种意气用事的时候。当然，乱极乱久思静思治，自己让权，威权从中产生。不彻底的革命带来的乱局，带来的“混乱自由”考验了大家的心智。比起政党政治来，他们更寄望于政府政治；比起议会党来，他们更寄望于革命党；比起革命党来，他们更寄望于一个领袖、一个主义……

自由主义、实用主义者看重问题，胡适说：“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，却去高谈社会主义；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，家庭制度如何救正，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，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，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；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，‘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’。老实说罢，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，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，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！”

但自由主义、实用主义者却是不应回避政治的，胡适的问题主义在当时也不切实际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没有看到，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都急切地要求一个“说法儿”，要求碰撞出一种政治权利机制；他没有看到，当时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之严重，根子在于政治体制有问题。他后来投身政治，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。

不仅如此，当时问题主义的双方都没有从文明的转变、社会实际出发，即如何从难得的混乱自由里重建伦理底线、社会共识、政治生态，重建政道关系。一句话，传统士大夫们的清议行为如何转化为现代公民责任，落实为生命权（信仰自由）、说话权（言论、出版自由）；孩子们的游行示威如何摆脱“东汉末年太学生、两宋太学生、明末东林和复社、几社的传统”，而能落实为交友权（结社、集会自由）。

六

梁启超、胡适的改良自由主义或实用主义思路，在当时后来都不乏实践。张謇在南通的承包实践，陈炯明在福建、广东的治道实验，卢作孚的北碚建设，以及晏阳初、梁漱溟们的乡村教育运动，都说明中国改良思潮的生命力。这种改良思路，从积极的角度看，它说明移风易俗的可能性和时效性，跟传统文明“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”的社会治理一样，那些把未来黄金世界允诺给现在的人们的谎言，那些动辄推托要一代人两代人世代努力的改革滥调，都在这种改良成果面前不攻自破。

但是，这种改良主义，却又像中国传说中的“息壤”一样，无能抵御现实中的洪水，更无能应对要求严苛的上帝和命运。无论革命的洪水，还是大环境的专制命运，都会使得这种改良昙花一现。山东的临沂、贵州的石门坎、山西的平遥，都曾一度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地

带，但不到百年，都成为贫困落后地区了。即使今天，二十年前的改革明星地区，仍有大量的返贫现象。

可以说，中国文明的转型乃是一场空前的革命，中国注定跟革命相遇，如果我们的先人、我们的五四圣贤们没能解决革命问题，我们就得接受这种革命遗产。如果“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，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，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”没能解决革命问题，如果我们的父辈不能解决革命问题，我们就没有告别革命世纪。

曾经呼吁“回到五四”的舒芜先生晚年反省，从改良者的对立面，一个五四之子、一个革命者的角度说明革命变异的洪水，舒芜痛切地说：“‘理力论’公式虽简，然乃自近百年历史概括而来，实乃至理。此理与力，又非自古以来帝王圣哲之理之力，而是划分人类‘史前时代’与‘真正人类自觉时代’之理之力，以‘科学’与‘阶级’之名，起大信，成大业，前史无可例比。千百万志士仁人，为之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不可简单地断为‘盲从’。其以力运理之机，至微至隐。当时信众，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，所循者规律，故艰难险阻而不辞，摩顶放踵而不悔。今日事后追论，轻易名之曰‘主流’，曰‘权力意志’，其实当时居主流地位有权力后盾者，是三民主义、法西斯主义、周孔之道等等，而科学社会主义之归宿则在雨花台、渣滓洞，乃千万人共见共知之事实。或亦正似此故，其以理运力之机，遂难觉察。窃谓解放前白区信众，最是纯粹。苏联与中国苏区的大量血的事实，在白区毫无所闻。间有传闻，则以出于国民党之口，由逆反心理而拒不肯信。鲁迅之睿智，亦有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之作，有《答中国托洛茨基派》之信。非君子可欺，其实都因为真相的揭破出自太黑暗太卑鄙者之口，从反面作了有力的宣传也。自顾以此纯粹之心，迎接解放，坚信一切皆是‘理’的胜利，一切皆是‘理’的流行，汲汲于湮误从真，而不自知已舍理从力。”